

“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与中国对外援助*

张郁慧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这种外交战略决定了在对外援助中中国必然把援助越南、朝鲜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首选对象。中苏分歧日益扩大后, “一边倒”战略名存实亡。为了拓展外交局面, 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

[关键词] 一边倒; 国家利益; 对外援助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1)03-0018-07

新中国成立后, 在美苏尖锐对立的两极格局的国际背景下, 中国在对外战略的选择上做出了“一边倒”的重大决策。这就决定了中国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援助对象。万隆会议后, 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 中国的对外援助由周边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了新独立的亚非民族主义国家。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 中苏之间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分歧日益凸显并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 “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名存实亡。为了拓展外交局面, 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

一、对外援助：“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必然结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面临着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和恢复经济的艰巨任务。尽管如此, 中国仍然迅速地走上了对外援助之路。这是处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 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

战略的必然结果。

1949年6月30日, 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回答了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尖锐对峙的国际气候下, 新中国的外交应向何处去的问题。他说: “一边倒, 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 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 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经验和二十八年经验, 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 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 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1](P.1472-1473)}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定在外交上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是综合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和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三个方面的考虑作出的正确选择。

从意识形态上来看,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 与苏联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

* 本文为黑龙江省社科研究规划项目《建国后的苏联援华与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批准号: 06D095)的阶段性成果。

都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的奋斗目标。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从加入之日起就一直坚定地站在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并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2](P.116)} 尽管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过错误，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3](P.283)}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为了获得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一度不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要求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但战后恰恰是由于苏联在东北对中共的支持和援助为中国共产党从军事上战胜国民党奠定了坚实基础。从理论上讲，正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在外交上把自己归属于同样信仰马列主义的、世界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建立的、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是顺理成章的。这是因为中国和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4](P.1)}

从国家安全利益上来看，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当时对新中国政权的威胁主要来自内外两个方面。从国内来看，主要是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还在进行负隅顽抗。从国外看，美国继续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敌视中国革命。另外，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估计中国革命胜利后也有可能像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情形一样，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毛泽东认为，保卫中国革命胜利果实的外部条件，“特别重要的，是苏联的存在和声援”，“没有苏联，我们都可能被人家吞掉。”^{[5](P.140-141,626)} 有了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中国才不会孤立。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苏联结成战略上的同盟，这就使“帝国主义者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6](P.131-132)} 事实正如毛泽东所料。

当1950年美国侵朝战争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时，不论在中国出兵前的战略决策中，还是在中国出兵后的战争进行中苏联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对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上，建国后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政党，根本没有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非常需要苏联的帮助和支援。1949年1月，米高扬到西柏坡时，刘少奇曾对他坦言：“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后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对我们将起决定性的作用。”^{[7](P.59)} 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指出：“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8](P.1433)} 将是中国快速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他认为“如果拒绝同苏联友好相处，那就只能损害本国人民的真正利益”。^{[9](P.618)} 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的一个主要目的也是争取苏联的援助。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联的大力援助对中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经济恢复的任务、奠定国民经济基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出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已分裂为两大阵营的情况下，选择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

“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决定了建国后中国对外援助的对象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需要援助的国家。在1949年6至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中苏两党就已对此达成了协议。在双方会谈中，斯大林高度评价中国革命对落后国家革命的榜样作用，肯定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10](P.299)} 接着，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总而言之，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

际义务!^{[11](P.368-369)} 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斯大林的建
议。建国初期, 尽管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
台湾问题也没有解决, 但出于共产党人的国际主
义义务和民族荣誉感, 中国还是担负起了向越南、
朝鲜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供援助的责
任。

二、援越抗法: 中国 对外援助的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南部的邻国越南
正处于抗法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几乎就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时, 越南就向中国提出了援助
的请求。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尽管国内面
临着恢复经济的重重困难, 但中国仍毅然承担了
援越抗法的任务。中国的对外援助由此拉开了序幕。

1950年1月30日胡志明到达北京, 亲自向
中国求援。当时因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访问,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接待了他, 并“对他
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12](P.241)} 根据胡志明
的要求, 刘少奇安排他于2月3日晚乘火车去莫
斯科同斯大林和毛泽东讨论援越事宜。因中苏两
党此前关于国际共运问题有过分工, 斯大林表示
“援越工作主要由中国负责”。^{[13](P.259)} 中国于是成
为抗法战争中“唯一从各方面援助越南的国家。”^[14]

为开创越南抗法斗争的新局面, 夺取抗法战
争的胜利, 中共中央首先任命罗贵波(原中央军
委办公厅主任, 1950年初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越
南联络代表, 1950年9月回国汇报工作后被任命
为驻越南总顾问和援越政治顾问团团长, 后来担
任首任中国驻越南大使。)为中共中央驻越联络代
表去越南了解情况, 接着派出了以韦国清(原第
三野战军第10兵团政委)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
并派陈赓(原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四兵团司令
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越南帮助组织边界
战役以打通中越边界交通。后又派出了由罗贵波
为团长的政治顾问团, 同时对越南给予武器装备
和军事物资援助。

除了派遣顾问, 中国还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
武器装备和后勤军需物资援助。在4年的越南抗
法斗争期间, 中国向越南总计提供了近12万支
(挺)枪和4630多门火炮及大批弹药、通信和工
兵器材等装备及军需物资。至1954年底, 共装备越
军主力部队5个步兵师、1个工炮师(1个工兵团、
3个炮兵团)和1个高炮团、1个警卫团, 并为越
军发起较大规模的战役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15]
^(P.520)1950—1954年, 中国共向越南提供了价值1.76
亿元的物资援助。^{[16](P.26)}

中国的援助对越南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起了
重要作用。如果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和英国
在马来亚的战争相比较可以进一步说明中国援助
的重要性。为了恢复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 法国
与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相继卷土重来,
两国的殖民战争都分别遭到了越南和马来亚共产
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抵抗。在中国的帮助下, 越
南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马来亚由于缺乏外来
援助又再次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7](P.64)}

1954年7月, 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停
战协议》签订后, 越南进入了战后重建时期, 中
国对越南的重建工作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
了极大的援助。

为了帮助越南迅速恢复经济, 1954年8月,
中国政府派出了以方毅、乔晓光为首的由145名
专家、顾问组成的顾问团, 协助越南政府和各经
济部门制订政策、规划, 提供咨询和建议。1956
年4月顾问团结束工作回国。为了在国外第一线
加强对越南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中
国设立了驻越南经济代表处, 方毅任经济代表。
1955—1956年间, 中国共向越南派出了19个技术
专家组, 帮助越南恢复和建设了有关项目。

1955年7月7日, 周恩来和来访的越南民主
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签署了中越两国政府联合公报。
根据上述公报, 在越南战后经济恢复时期(1955—
1957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提供了物资、现汇、成
套项目等多方面的经济技术援助。1955到1958年,
中国对越南的经济援助已达11亿元人民币。^{[18](P.1)}

三、抗美援朝：继援越抗法后的又一次重大援外行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满周岁。经历了几十年的反侵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消耗，国家的财政、经济都相当困难。城市三四百万职工和知识分子需要就业，农村数千万农民遭受了自然灾害，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剿匪反霸斗争还在进行。军队武器装备十分落后，只有单一的陆军，海、空军都处在初创阶段。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没有恢复。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为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支持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统一斗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决定派志愿军出国作战，拯救邻国于危难之际，帮助朝鲜抵抗美国的侵略。

毛泽东曾说，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是彻底地认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19](P.106)}为了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从物力和财力对朝鲜给予了巨大、无偿的援助。从1950年6月至1953年底，中国政府向朝鲜政府无偿提供了大量战争急需和人民生活必需的物资，总值为人民币72952万元。此外，中华救济总会还运送了大批粮食等物资支援朝鲜人民。^{[16](P.24)}

中国在抗美援朝中承担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据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证实：“仅从志愿军来说，到停战为止，前后入朝转换参战的有步兵27个军和1个师，有航空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公安部队共40多个师，还有大批铁路员工和民工，共100多万人。在战争中光荣负伤和英勇牺牲的就有36万人。其中在战场上献身的军级干部3人，师级干部10多人，团级干部近200人。”^{[20](P.659)}阵亡的志愿军干部中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徐焰对伤亡人数做了更详细的统计。根据他的研究，志愿军在战争中阵

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21](P.322)}

为了帮助朝鲜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中国还承担了高额的战争费用。1950-1952年，中国的军事国防费用支出分别占财政支出总额的41.16%、43.12%、33.61%。^{[22](P.129)}由于军事装备落后，中国用贷款的形式从苏联购买了大量武器。根据沈志华教授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向中国提供的13笔总额约为66.163亿旧卢布的贷款中，抗美援朝贷款总计大约是32亿旧卢布，占贷款总数的48%。^{[23](P.398)}在战争中，中国军队共消耗各种物资约560万吨，其中包括弹药25万吨。^{[21](P.323)}据总参谋部1953年统计，中方军费共消耗62亿元（按当时汇率相当于26亿美元）。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全部战争费用多达100亿美元。^[24]

需要说明的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对朝鲜的所有援助都是无偿的。1953年11月23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的谈判公报指出：鉴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开支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起，截至1953年12月31日止这一时期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25](P.925)}

1953年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进入了战后重建时期。中国继续给朝鲜以大力支持。

四、万隆会议：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与援助范围的扩大

1955年4月18日-24日召开的万隆会议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从亚非会议闭幕到1963年底，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了20个（除了古巴外都是亚非国家）。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明显扩大了，而且通过实行总交货人部制的援外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了对援外工作

的管理。

首先，中国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从周边发展到了欧洲和拉丁美洲。这一时期，中国除了继续帮助越南和朝鲜进行战后重建外，还向亚洲的蒙古、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以及远在拉丁美洲的古巴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如1956年8月29日，中国与蒙古签订了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规定：中国在1956年至1959年内向蒙古提供1.6亿卢布（旧币）的无偿援款，帮助蒙古建设工业、农业、交通、文化设施等13个项目（后来实际建成14个项目）。^{[26](P.87)}1952年匈牙利发生灾荒，中方迅速向其提供了5万吨粮食。^{[26](P.54)}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国向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无偿赠送了价值3000万卢布的物资。1957年5月，中匈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向中国向匈牙利提供现汇贷款的协定。^{[16](P.37)}为支援古巴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国提供了近2000支（挺）各种枪和800门无后座力炮，特别是当时中国刚刚开始生产高射机枪，在人民解放军还未装备的情况下就优先援助了古巴。^{[27](P.47)}1960年11月，中古两国政府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中国承诺从1961年到1965年给予古巴2.4亿卢布（折合60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中国还决定1961年购买大量古巴出口商品，包括食糖100万吨，以缓解由于美国停购古巴食糖给古巴造成的经济困难。^{[28](P.227)}

其次，中国开始向新独立的亚非民族主义国家提供援助。民族主义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过去曾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十分落后。独立以后，都面临着发展经济，通过实现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的艰巨任务。中国和这些国家有着相同的命运，尽管当时中国自己也面临着许多经济困难，但仍然尽可能地向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些援助，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1957年3月5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访问亚欧11国的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正在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

济援助。这些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然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这表示了我们对帮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真诚愿望。”^{[28](P.173)}这一时期中国向亚洲的柬埔寨、尼泊尔、也门、缅甸、巴基斯坦、锡兰（现名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老挝、叙利亚等国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还同非洲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等国政府签订协定，向他们提供军事和经济技术援助，标志着中国同这些新独立国家之间合作关系的日益发展。

第三，实行总交货人部制的管理体制。在20世纪50和6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参考苏联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项目的做法，实行的是总交货人部制。

1958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在批准并转发陈毅和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指出：“为了确保援外项目的工程质量和按期完成，拟采取总交货人制度。国家计委按援外项目的专业性质，指定中央有关部担任总交货人。总交货人应该根据承担的项目，负责选调人员，搜集资料，勘察厂址，编制和审定设计任务书，编制援外预算，供应设备和材料，进行设备安装、调整和试运转等工作，并且负责培训受援国家的生产技术人员。但是，鉴于体制改变后中央各部分权力下放的实际情况，中央总交货人部可以根据地方的工业特点和生产能力，委托某一个省、市、自治区负责完成援外项目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任务。总交货人部和有关地区必须加强协作，共同保证任务的完成。”^[29]

1961年以后，由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和后来的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负责协调各总交货人部和协作交货人部的工作。

五、中苏关系恶化：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日益凸显。特别是1959年苏

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美后,中苏两国在对美战略上也发生了重大分歧。赫鲁晓夫开始把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协议,撤走了专家。在这种情况下,“一边倒”的对外战略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实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并利用各种手段挑拨、阻挠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

为了在错综复杂和激烈动荡的国际形势下打开外交局面,打破美苏两国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和企图孤立中国的局面,中国在继续坚持同美苏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把发展对外关系的重点转向了民族独立国家。中国政府在政治上继续坚决支持民族独立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在军事和经济技术上加大了对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以增强中国与这些国

家之间的关系。中国还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增进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和友谊。1964年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加纳期间,在回答加纳通讯社记者的提问时,正式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准则,此后中国对外援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对外战略,“一边倒”不仅决定着作为中国外交重要手段之一的对外援助的走向,而且在中国对外援助的管理体制的选择上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随着中苏两国在内外政策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使“一边倒”的战略名存实亡。此后,中国为了开拓更加广阔的外交空间,进一步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对外援助成为中国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A].毛泽东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A].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 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A].周恩来外交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5] 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A];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A].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6] 毛泽东.缔结中苏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A].毛泽东外交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7]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8]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A].毛泽东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A].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0] 杨奎松.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A].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1] 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3] [越]黄文欢.沧海一粟——黄文欢革命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14] 黄文欢.在纪念越南八月革命胜利4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85-08-19(4).

[15] 韩怀智,谭旌樵.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M](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6] 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7] Qiang Zhai.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M].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

- [18] 肖祖厚,李丹慧. 云南与援越抗美 [Z].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 [19] 毛泽东.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 [A]. 毛泽东选集(第5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 [20] 杜平. 在志愿军总部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 [21] 徐焰. 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 [22] 楼继伟. 新中国50年财政统计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 [23] 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 [24] 包国俊. 抗美援朝战争历史不容歪曲 [N]. 解放军报, 2000-11-01(1).
- [25] 刘国光,王刚,沈正乐.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Z]. 北京: 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0.
- [26] 裴坚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49—1956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 [27] 中国的对外军事援助. 党史博采 [J]. 军事文摘精华本, 1997(11).
- [28] 谢益显. 中国当代外交史 1949—1995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 [29] 中共中央批转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的请示报告》 [N/OL].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1/05/content_2419146.htm.

(责任编辑 双木)

· 学术信息 ·

美国海洋安全战略的历史演变

季晓丹、王维在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2期的《美国海洋安全战略：历史演变及发展特点》一文中指出：从建国初期至19世纪末，美国的海洋安全政策主要是为美国的独立、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在北美大陆的领土扩张服务的。在独立战争和第二次美英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采取了海上袭扰的方式，攻击敌舰和破坏敌人的海上贸易，在独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第二次英美战争后到19世纪末，美国采取了以建立海岸要塞防御体系为主，以海军“巡洋作战”为辅的方式，保护美国本土免遭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威胁，确保美国“西进运动”的顺利进行和在北美大陆的领土扩张。从1890年到1991年冷战结束，美国奉行的海洋安全战略是争夺海洋霸权的战略。这100年是美国走出美洲、进入海洋、迈向世界的100年。因此，有人把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1890—1945年期间，美国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下，其海军开始成为海外扩张的首选工具，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最终成为世界海洋的霸主。1945—1991年冷战期间，美国始终奉行以遏制苏联“扩张”为核心的全球战略；在海洋安全方面，于20世纪80年代初推出了“海上战略”。该战略使美国在与苏联的海上争霸赛中赢得了霸主地位，同时加快了冷战结束的进程。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世界的意愿日益强烈，开始调整其海洋安全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海洋安全的文件、倡议及战略，其目的是要维护美国的海洋和世界霸权。

(方匡)